

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复兴运动的新趋向

张 莉

内容提要: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和社会动荡之际,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出现了新的政治复兴之势。在政治主张和策略方面,它们利用“伊斯兰恐惧症”,以穆斯林移民作为主要攻击目标;提出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主张“重新民族国家化”,同时寻求建立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欧洲联盟。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新变化从多重意义上影响了欧洲民主政治,使文化价值认同成为政治分野的一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 欧洲 右翼民粹主义 政党 复兴 文化价值认同

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欧经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和北非政局动荡带来的“移民海啸”,令欧盟建设出现新的危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欧洲社会民众中流行的穆斯林恐惧症和疑欧情绪,掀起了一股新的右翼民粹主义复兴运动。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仅在各种选举中取得进展,而且其政治主张也通过一些中右翼政府的政策渗透到了现实政策中。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右翼民粹主义表现出了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征。它们把经济利益和阶级政治转化为文化认同和身份政治,并把文化认同和价值作为政治分野的一个维度固定下来。如人们所评价的,“民粹主义论题成为当代欧洲的关注中心”并迫使西方民主政体“认真对待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①

*本文得到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 10C06)的资助。
^① Chantal Mouffe, “The ‘End of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Francisco Panizza ed.,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London-New York: Verso, 2005, p. 50.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一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复兴

近 20 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各国纷纷抬头,并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个小的政治高潮。此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虽一度受挫,但借助于全球金融危机下动荡社会的形势,近年来再次显示出其日趋发展的政治影响力。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社会中部分人们的不安全感,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新种族主义思想,其主要政治主张包括反对外来移民、反对腐败的政治阶级、怀疑和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这些带有蛊惑意味的政治主张引起一部分对现有的社会感到不安的选民的共鸣,一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世纪之交相继取得一些政治突破。1999 年,奥地利人民党与极右翼的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引发了欧盟的集体制裁。2002 年,法国国民阵线党主席勒庞在第一轮总统竞选中击败了社会党候选人诺斯潘,与希拉克进入第二轮的对决,这在当时被视为法国乃至欧洲的政治大地震。同年,荷兰的极右翼组织富图恩名单在其领导人富图恩遇刺身亡后分别在下议院和上议院获得 26 和 17 个席位。而意大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北方联盟也在博西的领导下,作为意大利第四大党和北方地区的第一大党,三次参与了由贝卢斯科尼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不过,这一时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在欧洲的发展并不平衡,而且很快这些政党因党内分裂、领导人更替、资金短缺等问题,除了意大利北方联盟外,影响力一度下降。

近年来,由于欧洲经济和社会形势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背景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开始重新崛起。除了意大利的北方联盟继续保持稳定的政治地位外,^①一些一度沉寂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重新显示力量。在 2010 年的法国大区选举中,在执政的右翼联盟惨败的情况下,国民阵线获得了近 10% 的得票,在 22 个大区中的 12 个进入了第二轮,并平均获得了 17.8% 的选票,显示其重返法国政治版图的趋势。奥地利自由党在 2002 年大选重挫后逐渐恢复了力量。2008 年大选中成为主要的赢家、在执政的社民党和人民党得票率均下降的情况下,自由党得票率增长了 6.5%。在 2010 年举行的维也纳市政选举中,自由党也获得了 27.1% 的选票,成为维也纳市议会第二大党。在荷兰,

^① 北方联盟在 2009 年的地区和市镇选举中赢得了 270 万选民的支持,成为北方地区最受欢迎的地区性政党,并成为贝鲁斯科尼领导的中右翼联合政府的稳定的合作伙伴。

继承富图恩衣钵的吉尔特·维尔德斯 2005年组建了新自由党 (PVV, Partij voor vrijheid), 它在 2006年首次参加议会选举就获得了 9个席位, 被誉为荷兰政坛的“一匹黑马”。在 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和 2010年的国内选举中, 该党均成为荷兰的第三大党。此外, 在一些国家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异军突起, 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例如, 在素以包容性著称的瑞典, 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反对接纳更多外来移民的民主党以 5.7% 的得票率首次突破 4% 的最低门槛进入国民议会, 并获得 20个议席。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 (Perussuomalaiset True Finns) 在 2011年四月的大选中也一举成为芬兰第三大党, 并打破了长期由社会民主党、中间党和民族联合党联合执政的稳定格局。该党加入组阁谈判也引起了欧盟以及其他成员国的担忧, 担心芬兰政府拒绝批准欧盟对葡萄牙的援助计划。甚至在英国, 极右翼的英国国家党 (British National Party) 也在 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首次获得了 2个席位。

如果说早期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在地域和政治影响方面都带有明显的边缘性特征的话, 那么新的右翼民粹主义复兴正在突破这种边缘性, 显示出一种“泛欧洲”的特征。

二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主张的新变化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上述政治复兴之势既得益于欧洲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也受益于这些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在政治主张和策略上的一些变化。它们利用了经济衰退形势下人们的不安全感的加强和对政府的怀疑, 在进一步宣扬反对外来移民的政策的同时, 利用“伊斯兰恐惧症”, 把伊斯兰移民当作主要攻击目标; 利用经济危机条件下欧盟的危机, 突出疑欧论的观点。与此同时, 这些力量通过一些跨国政治联盟活动进一步渲染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张。

(一) 利用“伊斯兰恐惧症”, 以穆斯林移民为主要攻击目标

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极右政治势力显著的政治特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特点也是把欧洲各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移民问题。右翼民粹主义者利用了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中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分化, 声称代表在此过程中的“弱势的”、“被剥夺的”群体, 但他们却把移民作为这一问题的替罪羊, 宣称正是这些外来移民滥用和偷盗了社会福利、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以及犯罪和社会不安全。他们借此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福利沙文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

勒庞竞选总统的口号就是“为法国人民投票!”。

不过,勒庞、海德尔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早期领导人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极端种族主义色彩,经常公开为纳粹辩护。而近年来新一代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则改变了策略。一方面,他们在一些种族主义问题上变得更为温和,试图改变自己与社会主流价值不相容性。例如,2011年1月新当选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的马琳·勒庞不赞同父亲勒庞否认大屠杀和反犹太的主张,表示希望把国民阵线改革成为一个强大而受欢迎的政党,不仅受到右翼选民的欢迎,也能为整个法国所欢迎。为此她努力改善国民阵线的形象,如穿着正装,深入北部的加莱工业区和工人亲切交流。另一方面,他们在鼓吹狭隘民族主义方面更有针对性。他们把主要的目标放在移民问题上,尤其是利用了“9·11”以来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集中以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为攻击对象。他们发现,利用这一心理动员对伊斯兰移民的仇视要比笼统地仇视外来移民更加有效。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荷兰的新自由党领导人吉尔特·威尔德斯。他剪接了17分钟的反对伊斯兰教的电影“Finta”^①,并因此成为西欧反对伊斯兰移民的代言人。

在煽动民众的反移民情绪时,右翼民粹主义者诉诸一种文化差异理论。大量移民涌入欧洲国家被视为是对后者“文化认同”和“民族特质”的挑战。例如,曾经担任柏林市政委员会财政委员的社会民主党人蒂洛·扎拉青(Thilo Sarrazin)就在其题为《德国在自取灭亡》(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的一书中,指责政府的民族融合政策是对德国“文化认同和民族特质”的挑战。

在借用这一理论煽动反伊斯兰教情绪和攻击穆斯林移民时,右翼民粹主义者刻意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与欧洲文化和价值不相容并破坏了其传统和根基的一种极端的宗教。他们把穆斯林罩袍、《古兰经》和尖顶的清真寺等视为对欧洲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挑战,或直接把伊斯兰移民与恐怖分子、犯罪联系起来,甚至极端地要求禁止一切形式的穆斯林移民。威尔德斯以其煽动性的言论和禁止发行《古兰经》禁止建造清真寺和禁止穆斯林移民的宣言而闻名。他认为伊斯兰教是停滞不前的文化构成的思想体系,并且把《古兰经》比作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主张禁止宣传《古兰经》和穿穆斯林罩袍,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征收“头巾税”。他在“Finta”电影中把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描绘为将要毁灭西欧民族

^① “Finta”是阿拉伯语,意为“冲突”或“神裁法”,威尔德斯剪接的这部电影中有“9·11”美国遭到恐怖攻击事件的画面,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炸弹攻击,并夹杂有引用《可兰经》语句的旁白。在2008年3月上映,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谴责,而威尔德斯因在荷兰煽动仇恨和种族歧视遭到起诉。

和文化的邪恶势力。而且马琳·勒庞也谴责伊斯兰长袍和清真寺。比利时的弗兰芒利益党则将毒品交易增多和社会不安全增加归咎于穆斯林移民,强调采取强硬的反对外来移民和打击犯罪的政策。反对穆斯林移民成为这些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动员的有效工具。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试图以文化差异和民族认同之说淡化其种族主义的特征。但这种夸大外来移民与本民族的差别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新种族主义,正如法国学者塔吉耶夫所说,“侮辱、歧视和彻底排斥从而借用价值和标准,如宽容、尊重他人、差别权等名义实施,所有这些都是新种族主义的高尚遁词……象征性的或掩饰性的新种族主义是适合于反种族主义时代的种族主义,也就是说,是适应以抛弃种族主义的共识为特征的后纳粹时代的种族主义”。^①

(二) 从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怀疑到“重新民族国家化”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问题。面对欧盟的不断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一些欧洲民众担心本民族的利益有被忽视、被剥夺的危险,甚至担心会丧失本民族的特征。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利用人们对欧洲未来感到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心理,极力渲染一种欧洲怀疑论。而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在欧洲的蔓延,这样一种不安全感被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一步放大,其政治主张也进一步转向了一种“重新民族国家化”(Renationalization)。

利用欧洲一体化扩大进程中人们对本民族利益的担心,以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为辞,渲染欧洲怀疑论,鼓吹排外主义,这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的政治特点。随着欧盟范围的逐步扩大和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深,抵制欧洲货币联盟、欧洲一体化深化和欧盟扩大化,而且拒绝承认欧盟的许多权力等等成为欧洲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意大利北方联盟领导人博西把欧盟称为“欧洲的苏维埃联盟”,认为欧盟的这些权力已经蜕化为“不民主”、“腐败”的布鲁塞尔和大企业家操作的“法西斯”阴谋。同时他也以极富煽动性的语言表示全球化对意大利的冲击:“来自欧洲中心的超级市场和巨型超级市场,它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它们的全球商业销售网络,它们可以给我们带来巴黎的蜂蜜、汉堡的熏火腿、巴伐利亚和法国的奶酪、比利时和荷兰的牛奶。再见了,意大利的商业!再见了,帕达尼亚的农业!店铺将要关

^①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瀚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门,商业网络将要由外国大集团控制”。^① 同样,欧盟也成为奥地利自由党的攻击目标。近年来,经济衰退加剧了部分民众潜在的排外情绪和欧洲怀疑主义。自由党借此指责社会民主党与欧洲的政治精英同流合污,企图将奥地利带入险恶的多元文化和国际化进程中,这将直接威胁到奥地利民族的生存。法国国民阵线则以“阴谋”的字眼来抨击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勒庞宣称,“我们拒绝在欧洲联盟——‘全球主义者’乌托邦的祭坛上牺牲法国,我们拒绝这些欧盟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侵犯我们的领土,侵入我们的边境,拒绝他们掠夺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破坏我们的公共社会安全,拒绝让法国人深陷‘全球化’的巨大泥潭之中……法国的未来不在欧洲”。^②

不过在此前一段时期里,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还只是从对欧盟扩大担忧的意义上表示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态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欧盟的价值体系。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欧洲的蔓延,右翼民粹主义的态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2009年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希腊、爱尔兰以及其他岌岌可危的PIIGS国家^③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欧盟的经济援助没有缓解危机,而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加剧正演变为欧元危机和欧盟危机。一方面,欧盟实施对希腊和爱尔兰的巨额援助引起了欧盟其他成员国纳税人的担心和愤怒。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为那些负债沉重的国家的不当财政和金融政策买单,并对欧盟和本国主流政党及执政党控制宏观经济形势方面的无能为力感到失望,由此逐渐失去对民主政治控制经济的信任。另一方面,那些受援国家为了获得援助不得不接受进一步缩减公共支出和削减政府赤字的欧盟援助条件,这引发了国内的反对浪潮。债台高筑的成员国民众拒绝缴纳更多的税费、反对国家资产的私有化和大幅削减公共部门雇员的经济紧缩政策。以上种种使欧洲货币机制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在此形势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国内进一步煽动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不满情绪,强调作为一种政治精英化和中央集权化的政治方案,欧盟已经危及各民

① Umberto Bossi *Processo Alla Lega*, Milan: Sperling & Kufer, 1998, p. 144. Quote from Thomas W. Gold *The Lega Nord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Ital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128.

② Jens Rydgren *The Populist Challenge: Political Protest and Ethno-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in Fr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p. 149.

③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因债务问题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这五个国家便被称为PIIGS国家(笨猪五国),参见孙杰:“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区的不对称性”,《欧洲研究》2011年第1期,第31页。

族国家传统的价值和主权。为了维持自己本国的国民认同和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政治机构,它们甚至要求“重新民族国家化”(Renationalization),即要求退回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的立场上来解决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不仅阻止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进程,甚至试图解构欧洲申根条约和统一货币体制。

为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调,欧盟正在走向可怕的“转账联盟”(transfer union),即节约且管理有序的国家要为管理不善且肆意挥霍的国家开出巨额支票。它们宣称要把这些国家驱逐出欧元区,甚至主张废弃欧元,重新使用本国的货币。正统芬兰人党党主席指责布鲁塞尔已“成为黑暗的心脏”,提出要修改欧盟政治内容,并表示芬兰不应该为别国的错误买单。瑞典民主党直接反对瑞典使用欧元,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并提出要重新考虑瑞典是否留在欧盟中。法国国民阵线党主席马琳·勒庞也提出法国应该从欧元体系中退出,重新使用法郎,并要求欧洲应该尽快恢复贸易关卡,在保护就业问题上采用适当的保护主义。^①奥地利自由党还发动了大规模的将希腊逐出欧元区的运动,得到了本国民众的响应。

随着突尼斯和利比亚战事的发展,大批的北非难民涌入欧洲,意大利对这些难民发放了临时签证,这些以法语为母语的北非移民进入法国寻找工作和避难,引发了欧盟成员国对申根协议国关于免签证的大讨论。法国国民阵线在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改革申根协议的运动。丹麦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作为丹麦政府中右翼少数成员,丹麦人民党以推迟批准“政府2020年经济计划”向政府施压,丹麦政府最终单边决定加紧边界检查,计划在与德国和瑞典交接的边界再次实施永久性的边界控制。5月13日,丹麦宣布在与德国交接的边界,包括位于福伦斯堡市附近的主要交接处帕德博恩镇设置新的电网和车牌识别系统,实施“永久性控制”。尽管丹麦政府坚持新的边界检查与申根协议不冲突,但这一行为严重挑战了申根协议的自由原则,也为其他成员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效仿对象,德国《明镜》称之为“分裂势力在欧洲聚集”。^②

(三) 试图使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欧洲化

与此同时,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在不断谋求欧洲范围内的政治联盟,加

① “Rise of Populist Parties Pushes Europe to the Right”,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Q_1518_758883_00.html

② “Dividing Forces are Mounting in Europe”,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Q_1518_762416_00.html

强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力量。奥地利自由党主席施特拉赫积极地与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弗莱芒利益党、丹麦人民党等较为成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接触,希望建立长期的信息交流和协调合作的跨国联盟组织。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由于新的欧洲议会党团的极右翼政党组织标准的改变,原分属于两个欧洲议会党团均无法单独组成议会党团,经过谈判,来自九个国家的极右政党组成了一个新的名为“自由和民主欧洲”的议会党团。^①

不仅如此,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还试图在更广的范围内扩大其影响。2010年8月14日,在法国国民阵线副主席戈尔尼施的安排下,以勒庞为首的西欧极右翼政党组团参拜了日本的靖国神社。此举意在借助经济危机将东西方的极右翼势力联合起来。此后不久,荷兰自由党主席维尔德斯于“9·11”纪念日在美国发表演讲,呼吁建立一个跨越大西洋的“自由联盟”,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穆斯林移民。维尔德斯还发起建立“独立自由联盟”,其目的是保卫自由和禁止外来移民,建立一个把伊斯兰教排除在外的统一的世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欧洲化乃至国际化趋向引起了欧洲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担忧。

三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欧洲民主政治的影响

上述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复兴之势正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着传统的欧洲民主政治的观念和政策。其中首要的表现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些观念和政治主张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了目前欧洲一些国家的现实政策当中。1999年,奥地利自由党参与由人民党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之时,欧洲政体曾为之震动。而在今天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参与执政已不足为奇。迄今为止,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曾参与组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些主要政治主张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为一些主流的右翼政党所吸收,包括在移民、欧洲一体化以及民族国家保护主义政策等问题上。在近

^① 原有的欧洲议会党团标准是要有来自6个成员国20个当选议员。而根据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后新的欧洲议会党团标准,一个党团必须有来自7个成员国的25名当选议员组成。按照这一标准,原欧洲议会中的两个极右翼议会党团“欧洲国家联盟”(Union for Europe of Nations UEN)和“独立/民主”(Independence/Democracy, IND/DEM)均无法单独组成议会党团。经过谈判,原分属两个党团的来自9个成员国的极右翼党代表组成了新的“自由和民主欧洲”(Europe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EFD)议会党团。

几年的欧洲国家选举中,欧洲保守主义的政治版图不断扩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主流的中右翼政党在不同程度上吸纳了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些政治主张,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持更严厉的态度,从而整合了中右翼力量。其中最典型的是法国的萨科齐领导的右翼政党和政府。2007年大选中提出的零移民政策、2010年驱逐罗姆人以及最近法国“禁止在公共场合穿穆斯林罩袍”法令的正式生效,这些过去人们大都会与国民阵线联系的政策却已经成为右翼主流政党的经常手段。“由右翼民粹主义提出并成功运作的移民问题、文化自治主义和公共安全問題,现在却在资产阶级主流政党那里得到发扬光大”。^①正如穆德所言,右翼民粹主义“真正的威胁不在于他们的竞选纲领得以实现,在最成功的范例中,如在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联盟政府内,很难将右翼民粹主义和主流右翼政党区分开来”。^②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欧洲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它使得身份认同的问题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过去几十年里,欧洲中左和中右的主流政党的政策日益趋同,由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政治终结”(end of politics)的概念,意指政治精英达成的共识政治,其特点是缺乏真正的替代党,主流政党的政治原则和政策价值都趋同。这种共识政治将政治功能减缩为仅仅是对政治讨论领域的所有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管理和处理。在此意义上,人们可以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复兴视为对这种政治终结的反击,是对冲突政治的一种回归。^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打破了主流政党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政治禁忌,利用“伊斯兰恐惧症”煽动对穆斯林移民的仇视,在退出欧盟、退出欧元等问题上放大欧洲怀疑主义情绪。受这类社会情绪的影响,在目前北非突尼斯和利比亚政局动荡引发的“难民海啸”中,欧盟大部分成员国的执政党拒绝安置这些难民,并打算暂停执行申根区国家人员自由流动的协定,以阻挡利比亚和突尼斯非法移民。受成员国的压力,申根协定也面临改革,它成为欧元之外的欧洲另一场危机。

由此可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成功之处在于把其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与一种文化价值的认同联系起来。它们夸大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

① Reinhard Heinisch "Success in Opposition - failure in Government 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Public Offic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6, No 3, 2003 pp 103 - 109.

② Cas Mudde "Extremist Movements", in Paul M. Heywood ed.,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Politic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146-147.

③ Interview with Chantal Mouffe "Pluralism is Linked to the Acceptance of Conflict", *Barcelona Metropolitan Magazine*, Autumn 2010, http://www.barcelonametropolis.cat/en/_page.asp?id=21&u=438.

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价值认同,将所有与自己不同的其他种族、民族或社会群体视为对本民族、国家和地区认同价值的威胁。在“文明冲突论”的语境下,不同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天主教与穆斯林的对抗(如国民阵线)、“世俗的/自由的”对穆斯林的对抗(如荷兰自由党)、或者“我们”与“他们”^①、本民族文化和价值与多元文化的对抗,把社会-文化维度政治化。即如艾伯齐塔和麦克唐奈在其《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一书中所指出的,民粹主义的幽灵之所以在西欧甚至在整个欧洲徘徊,是因为它们“巧妙地把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发的就业压力、安全担忧以及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特别是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联结起来从而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富有强烈个性色彩的较为成功的民主斗争”。^②

这一特点也引发了人们对右翼民粹主义讨论的侧重点的转移,即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转向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西欧的文化和价值层面的影响。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警告说,“9·11”事件后持续的“身份问题”(identity issues)加剧了“认同战争”(recognition wars),夸大和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差别。^③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愤怒的、难以同化的文化少数民族对占绝大多数的民众产生对抗情绪,这使多数的民众退回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的认同”。^④穆德也认为,“民粹主义话语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主流,而民粹主义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政治恰恰在于它内在具有的民主的时代精神”。^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反对伊斯兰选民、拒绝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颠覆了文化相对论价值,放弃不平等的主题而将文化差异绝对化,从而否定混合,肯定各种“文化”相互之间的不可吸收性。^⑥正如意大利政治学者伊格纳茨所评价的,“灵活多变地运用移民问题让后工业社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不同国家达成普遍的共识,依据价值和认同,而非经济或阶级利益来划分社

① 这是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参见[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 eds,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214

③ Zygmunt Bauman *Community -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2001, p. 76

④ Francis Fukuyama, "After the 'End of History'", <http://www.opendemocracynet>

⑤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6

⑥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第35页。

会成员”。^①

《西欧政治》杂志在其 2010 年的“西欧政治竞争的结构”专题中,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探讨了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西欧文化分裂和政治空间的两个维度形成的重要意义。西蒙·博恩席尔(Simon Bomschier)把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新社会运动倡导的世界主义的价值和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关注的不同共同体的差异称为“新文化的分裂”。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反对主流政党支持的多元文化和欧洲一体化,保卫文化传统和拒绝多元文化,它成为政治空间中与文化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价值相对的另一极。两者的对立构成了文化和价值的政治分野。^②安德里因·亨耶克(Andrija Henjak)进一步指出,移民是文化分野的主要因素,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移民比社会福利和传统的经济分野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③哈姆斯皮特·克里西(Hanspeter Kriesi)也指出,由新社会运动和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所代表的体制外政党的调整造成了政治空间的转变,它促使主流政党在这个转型的政治空间中重新定位。^④简而言之,由于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复兴,文化和价值作为欧洲政治分野的另一个维度,已深深地根植到了欧洲的政治竞争的结构中,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对西欧民主政治制度层面的影响范围。

(作者简介:张莉,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研究人员;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Piero Ignazi,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3.

② Simon Bomschier, “The New Cultural Divide and the Two-dimensionalities in Western Europe: Concept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3, No. 3, 2010, p. 422.

③ Andrija Henjak,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Socio-economic Context: How Welfare Regimes and Historical Divisions Shape Political Cleavag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3, No. 3, 2010, p. 498.

④ Hanspeter Kriesi, “Restructuration of Partisan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eavage Based on Valu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0, Vol. 33, No. 3, p. 683.

supplemen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tter

52 An Analysis of the Neo- Populism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and East Europe

XU Gang

During the time of the Third Wave, the Neo- Populism in the Middle and East Europe not only bears some similarities with the traditional Populism, but at the same time carr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In the 1990s, the Neo- Populist parties appeared in the Middle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However, they didn't become a mainstream political force at that time. Ever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Middle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joine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rofile of the Neo- Populist parties has been greatly heightened and they came to power in many countries successively. Although it is unknown how long the Neo- Populism would be an active actor at the political stage,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as a new force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Middle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it will undoubtedly serve as a "baromete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a test standard for the tolerance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70 The Revival of the Right- 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ZHANG Li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ears and the sense of insecurity that permeate in Western Europe caused partly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right- wing populist parties have revived in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past years.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shown in their political ideas and strategies, especially extreme Islamophobia against the Muslim immigrants, refus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calling for renationalization, and seeking for a "European Union" of the right- wing populist partie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right- wing populist parties has in many aspects changed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in Western Europe, making cultural recognition and identity politics a new dimension of political cleavage.

81 From the Lisbon Strategy to Europe 2020: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Governance

ZHENG Chunrong

One innovation of the Lisbon Strategy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oft governance tools introduced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as an example. However, the failure of